

政府补贴和企业出口动态: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叶宁华 张伯伟

摘要: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动态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企业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在政府对辖区内经济活动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补贴收入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的出口可能性,而且还能帮助企业维持其出口地位,而在政府行政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补贴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方向由正逆转负。进一步的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企业管理费用支出对其获得补贴具有越高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补贴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越低。改善营商环境、减少政府干预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营商环境;补贴收入;企业出口动态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贸易总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性亦在不断增强。经典贸易理论认为,沉没成本和贸易搜寻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在出口后不会轻易退出市场,从而在出口市场上维持较长的时间^①,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却暴露了中国出口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亦未能支持经典理论对出口持续期的判断,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往往较短,生存时间均值仅为1.6年,中位值则为3年。^②对中国微观企业出口动态的细致深入研究对于保障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平稳发展的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诸多研究关注过政府补贴和企业发展的关系,政府补贴不仅可以直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还能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企业的能力积累、经营扩展和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资金支持。^③苏振东等人发现补贴促进了企业出口^④,安同良等人的研究则认为补贴和企业研发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⑤。然而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学术界有众多学者开始对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质疑。余明桂等认为当企业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建

收稿日期:2017-10-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032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6YJC79012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720161071)

作者简介:叶宁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福建 厦门 361005)助教,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张伯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① Baldwin, R. E., and P. R. Krugman, "Persistent Trade Effects of Large Exchange Rate Shock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4), 1989, pp.635-654; Rauch, J. E., and J. Watson, "Starting Small in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1(7), 2003, pp.1021-1042.

② 陈勇兵、李燕、周世民:《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

③ 任曙明、吕镛:《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11期。

④ 苏振东、洪玉娟、刘璐瑶:《政府生产性补贴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出口》,《管理世界》2012年第5期。

⑤ 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立政治联系去获得财政补贴时,基于政治关联的政府补贴降低了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①刘海洋等认为补贴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得企业购买中间产品的成本上升,企业获得补贴后甚至可能出现高价购买原材料、低价销售产成品的“非理性”现象,换言之,政府补贴作为一种意外得来的财富会诱发企业的过度购买行为。^②任曙明和张静认为由于政府在筛选补贴对象时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补贴的正向激励效应被削弱,甚至产生了负向激励效应。^③而张杰和郑文平则认为政府对企业的补贴行为可能导致出口企业对此形成惯性依赖,进而削弱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投资提升生产效率形成高端出口竞争力的动机,最终引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可持续竞争能力的下降。^④由此观之,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持续存活能力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企业的补贴数额一直以较快的速度稳定增长,然而,不断增长的财政补贴资金是否真的能够帮助受补贴企业提升其核心竞争能力,进而在全球市场上成长为具有强势领导地位的国际企业,持续地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已有文献往往只是简单地关注政府补贴和企业出口概率及其出口额的作用上,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特殊的营商环境对企业补贴资金利用效率的重要影响。当营商环境不完善,政府行政势力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度时,辖区内企业倾向于通过寻租活动与对财政补贴资金具有支配权的政府官员建立特殊政企关系从而获得政府补贴,而在行政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寻租空间越大,企业的寻租激励越有可能高于其研发投资激励,获得补贴的企业也越倾向于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维持能够为其带来源源不断“意外财富”的政治关联,甚至挤占了对研发创新活动的投入。当外部市场需求下降,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加剧时,没能通过研发创新投资积累核心竞争能力的中国出口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被市场淘汰,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也将难以为继。因此,由实践指导意义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在考察政府补贴的实际经济效益时,有必要结合中国转型时期下各地区营商环境的差异性,使用更完整的模型来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据此解析如何提升政府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切实促进中国出口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从而探寻保持中国出口企业持续平稳发展的可行之路。

二、机制解析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土壤,处于转型发展中的中国,不同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差异显著。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可能从多个方面对企业如何获得和利用补贴资金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影响补贴收入与企业出口动态之间的关系。

企业如何获得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其对经济资源分配的介入程度也越高。^⑤政府干预经济越严重、政治透明度越低,权力行使缺乏有效监管,政企之间的“寻租空间”越大,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从而达到寻租目的的动机越强。^⑥具体来讲,在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更高的地区,寻租活动更为盛行,地方政府对补贴资金的配置可能是

①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② 刘海洋、孔祥贞、马靖:《补贴扭曲了中国出口企业的购买行为吗?——基于讨价还价理论的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0期。

③ 任曙明、张静:《补贴、寻租成本与加成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10期。

④ 张杰、郑文平:《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

⑤ 万华林、陈信元:《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期。

⑥ Helmers C., Trofimenko N., “Export Subsidies in a Heterogeneous Firms Framework: Evidence from Colombi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Economie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0-26.

基于“租金”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配,而并非基于使补贴对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配,寻租和政企合谋导致补贴流向非生产性目的“寻补贴”和亏损等低效企业。^①反之,如果政府官员对辖区内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营商环境越完善,政府行为受到的制度约束越大,政企之间存在越少的“寻租空间”时,那么补贴资金越能够到达最能够有效利用资金、具有最高投资效率的企业手中。^②

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还可能影响企业对补贴收入的利用方式。分权化改革以来,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公共资源,通过投入资源与政府建立某种特殊的政治关联能帮助企业获得政府之手的帮助,比如更多的政府补贴。相比于研发创新这一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向政府寻求补贴资金对企业而言是投资回报率更高的一种经营策略。一方面,为了获得政府补贴资金,企业需要投入资源去构建和维护紧密的政企关系,从而客观上挤占了企业在核心竞争能力上的投入^③;另一方面,企业在受到一些照顾后,行为将出现扭曲,进而导致生产的低效率。^④具体地讲,补贴资金的获得使企业可以据此选择在国际市场上实行低价竞争策略,导致企业主观上缺少通过研发创新提高其竞争能力的动力。这一粗放型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将使企业对补贴收入产生依赖,转而致力于持续不断地需求补贴。^⑤研发创新能力与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存活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⑥,当外部市场出现波动时,研发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竞争能力的企业将难以应对国际市场风险,进一步地也将难以维持其在出口市场上的市场份额,被迫退出国际市场。

在不同的政府干预水平下,补贴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具体影响可能完全不同。在政府干预行为越常见的地区,地方政府还有可能为了稳定就业,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资助即将破产的企业,而为了保证收入来源,只要救助企业的成本低于潜在的税收收入,地方政府也会选择给予财政补助帮助企业继续存活。^⑦更重要的是,在企业经营环境制度不健全的转型中国家,营商环境越不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或不恰当干预越多,权力行使愈发缺乏有效监督,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企业勾结的腐败和寻租活动越难以受到应有的约束,寻租活动更为盛行。^⑧较弱的市场化环境和盛行的寻租活动将削弱政府补贴的有效性。^⑨如果政府的补贴资金是基于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进行分配,那么获得补贴的企业可能会有更好的出口表现。反之,如果政府官员手中握有的补贴资源通过寻租活动来分配,那么能够获得补贴的企业不一定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而是能使政府官员寻租收入最大化的企业,这一类通过支付租金构建了紧密政企关系的企业会倾向于不断投入精力和资源去维护能够给其不断带来政府资源的特殊政治关联,而无意于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当企业致力于不断通过寻租获得补贴,那么即使企业成功进入了国际市场,也将被锁定在“低质竞价”的产业链低端,不利于培育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长期竞争能力。由于研发投入是影响企业市场竞争力与技术能力的重要因素,创新或研发能力的积累是影响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因素^⑩,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出口产品的吸引力,进而得以巩固其在出口市场的地位。如果企业获得补贴后能够将补贴资金投入发展自身竞争能力的研发创新活动中,

① 安同良、周绍东、皮建才:《R&D补贴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经济研究》2009年第10期。

② 苏振东、洪玉娟、刘璐瑶:《政府生产性补贴是否促进中国企业出口》,《管理世界》2012年第5期。

③ 杨其静:《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经济研究》2011年第10期。

④ 李明、冯强、王明喜:《财政资金误配与企业生产效率——兼论财政支出的有效性》,《管理世界》2016年第5期。

⑤ 张杰、郑文平:《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

⑥ 叶宁华、包群、张伯伟:《进入、退出与中国企业出口的动态序贯决策》,《世界经济》2015年第2期。

⑦ 申广军:《比较优势与僵尸企业: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管理世界》2016年第12期。

⑧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W., "Politicians and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1994, pp.995-1025.

⑨ 余明桂、回雅甫、潘红波:《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有效性》,《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⑩ Guan, J. and Ma, N., "Innovative Capability and Export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Technovation*, 23, 2003, pp.737-747.

那么企业将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获得长久持续的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实现持续出口。

为了回答在不同营商环境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机制问题,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检验。

假设1: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依赖于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水平,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获得的补贴收入不仅能够提高其出口概率,并且能帮助企业维持出口地位,而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过高的地区,补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为负。

假设2:在政府行政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管理费用支出对促进其获得政府补贴的正向作用越显著,换言之,企业在潜在寻租空间更大的地区越倾向于通过主动寻租获得补贴资金。

假设3:在政府行政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激励高于其自身的研发创新激励,获得补贴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越低。

为了从营商环境的角度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出口动态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考察,本文首先利用序贯决策模型(sequential logit model)对此进行总体检验,揭示不同营商环境背景下补贴资金对企业影响差异性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0年至2007年^①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统计年报》,依据已有文献,我们对样本异常值进行了初步筛选,包括把企业出口交货值、补贴收入、要素投入等关键指标存在缺失或异常统计值的观测值去掉。本文讨论企业出口动态情况,由于无法鉴别持续出口企业在样本期之前年份的出口表现,如企业何时进入出口市场,因此为了得到无偏估计结果,我们排除了在样本期初即2000年就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换言之,本文研究对象是在2000年未出口、而在2001-2007年间存在出口行为的企业。本文的核心变量是企业的补贴收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企业在每一年获得的补贴收入,本文使用企业2000年获得的政府补贴收入加上1之后取对数得到该指标。表1给出了区分企业出口表现的补贴收入统计信息。

表1 企业补贴收入的分类统计

出口持续时间(T)	$\ln(sub)$ 均值	$\ln(sub)$ 标准差	观测值	占比(%)
T=0(非出口企业)	0.531	1.705	85 488	90.79
T>0(出口企业)	0.638	1.908	8669	9.21
T=1	0.619	1.890	3838	4.08
T=2	0.684	1.992	1741	1.85
T=3	0.724	1.979	792	0.84
全样本	0.541	1.725	94 157	100

说明:表中数据由作者统计整理而得,企业占比为不同年份出口企业占全部出口企业的比重。

观察补贴指标的均值可以发现,相对于非出口企业(0.531),出口企业确实在样本初期获得了更高的补贴额(0.638)。而在出口企业内部,具有不同出口持续期的企业,其补贴指标之间也存在

^① 目前某些网站上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已更新到2013年,但是2008-2013年的数据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因而本文实证研究部分选择数据信息可靠性更有保障的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较大差异:出口一年期的补贴指标均值为0.619,出口二年期的上升为0.684,而出口三年期的则进一步增加为0.724。换言之,企业在初期获得的生产性补贴收入与企业之后的出口动态存在某种关系。那么,补贴收入与企业出口动态之间是否确实存在某种显著的正向关系,这是本研究要解答的关键问题。

(二)模型选择

本文使用序贯决策模型考察在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不同的地区,补贴收入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差异性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具有典型的序贯特征,例如,企业在2007年的出口存活概率是以该企业在之前年份(2001-2006年)都持续存在出口的条件概率,该特征决定了采用序贯决策模型对企业出口动态进行分析是更适宜的。^①通过对连续年份内企业出口行为的延续性进行序贯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考察补贴收入如何在每一个时点影响企业的出口动态决策。

在序贯决策模型框架下,假设目标企业利润函数为 U_t , U_t^e 和 U_t^n 分别为企业在 t 期选择出口和不出口的利润,那么 $U_t^e - U_t^n$ 服从逻辑分布,企业在 t 期退出国际市场的概率表示为:

$$P(t)_{n/e} = e^{U_t^n} / (e^{U_t^n} + e^{U_t^e}) \quad t=1, 2, \dots, T \quad (1)$$

假设 $U_t^e - U_t^n$ 在各期之间是独立的,那么企业在连续出口了 $T-1$ 期之后在第 T 期退出国际市场的概率为: $P(t) = P(t)_{n/e} \prod_{j=1}^{t-1} [1 - P(t)_{n/e}]$

(三)变量构建

要探究制度环境是否会影响补贴对企业出口动态的作用,我们还需在模型中加入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指标($instit_k$)与企业政府补贴指标的交叉项: $instit_k \ln(sub)_i$ 。我们选择樊纲等^②连续跟踪测算的中国各省市市场化指数构建中的一个分项指标作为制度变量来考察地区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instit_k$),这一指标主要包括市场分配经济资源的比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缩小政府规模,该指标数值越大,则说明该地区经济资源分配中市场力量的发挥越大、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小以及政府规模越小。

同时,参照已有文献,模型中还需对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出口动态的变量加以控制:(1)生产率($ln tfp$),是根据以“中间投入”作为企业要素投入代理变量的LP方法^③,采用半参数方法进行计算得到企业生产率(tfp),而后对其取对数($ln tfp$)。(2)企业资本密集度($logkl$),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企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度量,而后取其对数。(3)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从业人员年均人数来度量。(4)企业年龄(age),以企业实际经营年限来衡量。(5)企业研发能力(new),以新产品销售所占比重作为替代指标。(6)企业利息支出比重($finance$)。利息支出衡量了企业融资成本,反映了一个企业承受的融资压力和融资约束,用该变量除以产品销售收入额可得到企业利息支出比重。(7)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以民营企业作为参照系,加入了国有企业($state=\{0,1\}$)、外资企业($foreign=\{0,1\}$)两类所有制虚拟变量。若为国有企业,将 $state$ 赋值为1,否则为0;若为外资企业,将 $foreign$ 赋值为1,否则为0。同时,为避免变量间的内生性,企业特征变量都使用2000年数据计算得到。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了二分位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和区位虚拟变量($region$),以控制行业和区位特征因素的影响。

① 叶宁华、包群、张伯伟:《进入、退出与中国企业出口的动态序贯决策》,《世界经济》2015年第2期。

②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Levinsohn, J. & A. Petrin,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 2003, pp.317-342.

四、实证分析

在实证部分,我们首先报告生产性补贴收入与企业出口动态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然后报告生产性补贴的作用如何因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差异而改变,最后是补贴作用的机制检验,即补贴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之间的实证结果。

(一)补贴收入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企业的生产性补贴收入与企业所处地区的政府对经济干预指数的交互项 $[\ln(sub)_i \cdot instit_k]$,以考察在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下,补贴收入对企业出口动态影响的差异性。表2为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动态的序贯决策模型回归结果。

表2 补贴收入与企业出口动态:序贯决策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1v0	2v1	3v2	4v3
$\ln(sub)_i$	-0.096***	-0.008	-0.179*	-0.307**
	(-2.768)	(-0.115)	(-1.729)	(-1.971)
$\ln(sub)_i \cdot instit_k$	0.018***	0.002	0.025*	0.039*
	(3.675)	(0.195)	(1.705)	(1.839)
lntfp	0.400***	0.166***	-0.053	-0.058
	(17.150)	(3.289)	(-0.670)	(-0.588)
logkl	0.078***	0.036*	0.069**	0.019
	(8.034)	(1.881)	(2.333)	(0.527)
size	0.291***	0.188***	0.260***	0.104**
	(22.675)	(7.162)	(6.476)	(2.011)
age	-0.022***	-0.011***	-0.026***	-0.013**
	(-17.204)	(-4.297)	(-6.333)	(-2.389)
new	0.508***	0.095	0.497**	0.865***
	(6.505)	(0.656)	(2.206)	(2.957)
finance	-0.090	-1.124***	-0.751	-0.887
	(-1.411)	(-2.798)	(-1.018)	(-0.885)
state	-0.469***	-0.462***	-0.067	-0.510***
	(-11.319)	(-5.445)	(-0.490)	(-2.737)
foreign	1.010***	0.359***	0.550***	0.494***
	(33.239)	(6.390)	(6.569)	(4.920)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region	yes	yes	yes	yes
N	94 157			
Prob>chi2	0.000			

说明:括号中数值为对应变量估计系数的稳健性t统计值。*、**、***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都已控制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

表2中的第(1)列结果估计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影响,注意这里出口企业

(1v0中的1)不仅包括出口只持续一年的企业,而是包括所有出口持续期高于一年的企业,第(2)列中,我们比较的是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存活了一年的出口企业在第二年的出口决策,即选择继续出口还是退出,其余年份依次类推。另外,根据前文处理所得数据,出口期为四年及以上的样本较少,为了简洁并便于分析,本文将出口年限在四年及以上的样本归为同一类型。

企业出口参与。第(1)列是出口一年期的估计结果,该结果显示单独的补贴收入项 $[\ln(sub)]_i$ 系数显著为负,而补贴收入和政府干预变量的交叉项则显著为正。这就意味着,仅仅获得政府补贴并不必然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净效应依赖于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即随着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由高变低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概率的影响也由负转正。换言之,补贴收入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严重依赖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水平,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更低的地区,企业获得的生产性补贴能够提高其出口概率,而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更高的地区,补贴收入反而降低了其出口概率。

在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其他因素中,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具有更大的出口可能性,更大的企业规模以及较强的研发和融资能力也能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同时新近成立企业更可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①此外,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出口动态上也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异,以民营企业为基准,外资企业的出口概率更高,国有企业则更低。

企业出口持续。表2第(2)(3)(4)列分别给出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一年、二年和三年后的动态市场选择决策,即企业选择继续出口还是退出出口市场。观察这三列中补贴收入指标以及补贴和政府干预指数交叉项的系数,我们发现单独的补贴指标的估计系数符号全部为负,而补贴与政府干预指数交叉项的系数符号则在三列中皆为正,其中只有第(2)列的系数不显著,第(3)和第(4)列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这说明,对于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长期表现而言,政府补贴的作用同样依赖于企业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水平。

其他控制变量中对企业出口持续期具有显著作用的是企业规模、研发创新能力以及资本集中度水平,同时,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难以延续其出口地位,而外资企业则能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持续竞争能力从而维持其出口地位。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可能性更低,而外资企业的出口概率则远远高于本土企业。由于国际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且没有经营特权,经营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显著低于其他类型企业,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与国外合作伙伴更稳定的出口关系、更丰富的出口经验、掌握更多的国外消费者信息等提高了其出口竞争能力。

(二)影响机制分析

在不同地区,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存在差异,导致企业获得的补贴收入与其出口动态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值得进一步追问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则是,政府干预和补贴收入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动态?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在此提出两个命题假设:其一,在政府干预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分配补贴资金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官员更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设租以谋取个人私利,从而企业为获取补贴资源需要主动向政府官员支付一定的“补贴成本”。其二,在政府干预程度更高的地区,获得补贴的企业更不倾向于把补贴收入投入研发创新,这是由于在寻租空间更大的地区,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激励大于研发创新激励,从而影响补贴收入对企业出口的作用。为了验证政府行政干预的这一作用机制是否成立,本文接下来首先考察

^① Bernard, A., J. Jensen, S. Redding, and P. Schott, "Firm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3), 2007, pp.105-130.

在具有不同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地区,企业如何获得补贴收入,而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在不同制度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补贴收入。

1. 企业如何获得补贴:寻租与补贴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改革,使地方政府的事权大大增加,基本掌握了地方关键资源的分配权。^①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大量文献研究证实了企业同地方政府构建紧密政企关系的重要性,例如获取银行信贷、谋求政策优待等。^②而与此同时,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获取更优质的政府服务和更低的税率需要通过支出“好处费”来搭建“政府关系”^③,更有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政府和国企订单,需要通过更多的吃喝招待活动来构建同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④。那么类似地,为了获得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的补贴资金,企业是否也需要付出寻租成本来构建紧密的政企关系呢?我们此处以企业管理费用为研究切入点,考察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企业寻租行为与补贴收入之间的关系。

企业的寻租活动可能对其获取政府补贴收入具有重要影响,具体地,我们使用2000年企业管理费用占销售现值的比重作为企业寻租成本($overhead_i$),对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Subdummy_i$)及企业获得多少补贴资金[$\ln(sub)_i$]进行回归。如前所言,本文重点在于考察不同制度环境背景下寻租对企业获取补贴的差异性影响,为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管理费用与地区政府干预程度的交叉项($overhead_i \cdot instit_k$),从而识别政府干预行为的作用。表3给出了估计结果。

表3 寻租与补贴: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Logit Model		OLS Regression	
	(1)	(2)	(3)	(4)
	$Subdummy_i$	$Subdummy_i$	$\ln(sub)_i$	$\ln(sub)_i$
$overhead_i$	0.039* (1.696)	0.057** (2.024)	0.030** (2.14)	0.034** (2.48)
$overhead_i \cdot instit_k$	-0.005 (-1.529)	-0.008* (-1.867)	-0.004** (-2.02)	-0.005** (-2.42)
CV	no	yes	no	yes
N	94 321	94 321	94 122	94 122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说明:括号中数值为对应变量估计系数的稳健性t统计值。*、**、***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都已控制企业特征变量、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

其中,第(1)(3)两列只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没有加入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第(2)(4)两列则加入了这些虚拟变量。第(1)(2)两列是使用二项式Logit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表中管理费用

- ① 谭劲松、间宇寅、陈颖:《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的数据为例》,《管理世界》2012年第7期。
- ② Cull R. and Xu L. C., “Institutions, Ownership, and Finance: The Determinants of Profit Reinvestment among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7(1), 2005, pp.117-146; Faccio M., Masulis Ronald W. and McConnell John J.,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ournal of Finance*, 61, 2006, pp.2597-2635; 夏立军、陆铭、余为政:《政企纽带与跨省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
- ③ Cai H., Fang H. and Xu L. C., “Eat, Drink, Firms and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54, 2011; Wang Y., You J., “Corruption and Firm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3(2), 2012, pp.415-433.
- ④ 黄玖立、李坤望:《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overhead_i*)的系数反映了管理费用与企业获得政府补贴概率的关系。从中我们发现在控制了众多企业特征变量和行业、地区虚拟变量后,*overhead_i*的系数为正(0.05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的管理费用确实与企业获得补贴收入的可能性成正相关关系。

我们更关心的是管理费用与地区制度指标交叉项的回归系数,观察第(2)列的结果,这一交叉项(*overhead_i_instit_k*)的系数(-0.008)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当某一个地区的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低时,该地区内企业的管理费用与其是否能够获得政府补贴之间的正相关性减弱。这一结果证实了本文的主要猜想:正是由于经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市场发展仍然面临来自行政部门的干预,企业需要通过招待活动来努力获取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的补贴资金。换言之,企业如何获得生产性补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当地方政府越强势、干预能力越强时,补贴分配过程中存在的寻租空间越有可能被政府官员所利用。

我们继续观察第(3)(4)两列的估计结果,第(4)列中交叉项(*overhead_i_instit_k*)的系数显著为负(-0.005),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制度背景不仅对企业是否能够获得补贴具有影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企业获得补贴收入的额度也具有关键影响。综合表3的结果,我们发现,在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对补贴资金的配置确实更有可能是基于“租金”最大化的原则来分配,企业倾向于通过“主动寻租”去获得补贴资金。

2. 企业如何使用补贴:补贴与研发

在表2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能显著地提高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并且也能帮助企业成功停留在出口市场中实现持续出口。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扭曲当地企业的投资行为和经营策略,官员的“攫取之手”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①如果企业依靠研发创新和寻求补贴均可获利,那么在政府对经济干预更频繁的地区,企业研发创新的风险相对更大、期望获利更小,相反,企业寻求补贴的风险相对更小、期望获利更大,因而此时企业会理性地选择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用来争取政府补贴的“寻租之战”中,挤出或侵占本该投入研发创新活动的资金和资源。^②

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能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决策,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我们进一步用补贴收入和政府对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进行估计。我们分别使用企业是否获得补贴的虚拟变量(*subdum_i*)以及企业补贴收入对数值[$\ln(\text{sub})_i$]对企业是否有新产品销售进行估计,同时模型中还需加入补贴指标和地区政府干预指标的交叉项来考察政府干预对企业利用补贴收入进行创新的影响。

下页表4的第(1)(2)两列给出了估计结果。该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生产率、所有制、资本密集度等多个企业特征之后,补贴收入确实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概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地,单项补贴指标的系数都为负,其中是否获得补贴(*subdum_i*)的系数不显著,但补贴收入对数值[$\ln(\text{sub})_i$]的系数则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结果意味着,获得补贴并不必然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甚至为了获取更多补贴收入[$\ln(\text{sub})_i$]而进行的“寻租活动”对企业产品创新活动发生了挤出。进一步地,我们还关注两个补贴指标与地区政府干预指标交叉项的系数,估计结果显示两个交叉项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在那些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的地区,企业获得的补贴收入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而在政府对经济干预能力更强大的地区,无论是政府干预

① Fisman, R. and J. Svensson, "Are Corruption and Taxation Really Harmful to Growth? Firm Leve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3(1), 2007, pp.63-75.

② 肖兴志、王伊攀:《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决策——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9期。

对“寻租”的鼓励还是对研发创新活动的挤出,都将在客观上一方面导致补贴资源流向非生产性目的“寻补贴”企业和亏损等低效企业,另一方面则可能打击了创新积极性较高的企业,挤出了企业的研发投入。

表4 补贴与研发: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Logit Model		Fractional Logit Model	
	(1)	(2)	(3)	(4)
	newd	newd	new	new
$subdum_i$	-0.277 (-1.309)		-0.145 (-0.556)	
$subdum_i_instit_k$	0.073** (2.386)		0.060 (1.611)	
$\ln(sub)_i$		-0.073** (-2.149)		-0.064 (-1.636)
$\ln(sub)_i_instit_k$		0.015*** (3.124)		0.015*** (2.714)
CV	yes	yes	yes	yes
N	94 510	94 311	94 356	94 157
Prob>chi2	0.000	0.000	0.000	0.000

说明:括号中数值为对应变量估计系数的稳健性t统计值。*、**、***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平,回归中都已控制企业特征变量、行业和地区虚拟变量。

与此同时,我们还进一步使用补贴指标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比重进行了估计。由于当被解释变量为销售份额这类位于[0, 1]区间的分数时,采用OLS的传统估计方法很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偏误。因为根据OLS的拟合结果,可能会得到一些大于1或小于0这类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企业行为,从而会错误地估计样本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比重;其次,OLS所假定的线性影响关系也不适用于销售份额这类样本数据情形。因此,作为对OLS估计的改进,我们采用了针对分数型的特定估计模型。具体地,我们运用Pap和Wooldridge提出的分数logit模型^①(fractional logit),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比重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4第(3)(4)两列所示。

表4第(3)列的结果中,是否获得补贴($subdum_i$)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该指标与地区政府干预指标的交叉项($subdum_i_instit_k$)系数则为正,且该系数的统计性t值高达1.611,这意味着,仅仅获得补贴也并不必然能够提高企业的新产品销售比重,补贴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同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关。而观察第(4)列,单项补贴收入指标 $[\ln(sub)_i]$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补贴收入指标和地区政府干预指标交叉项 $[\ln(sub)_i_instit_k]$ 的系数则显著为正。换言之,补贴收入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依赖于其所处地区的营商环境,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较为良好时,获得补贴的企业才具有更强的动机将补贴收入更多地投入研发创新活动。

① Papke L. E., Wooldridge J. M., "Econometric Methods for Fractional Response Variabl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401(k) Plan Participation Rates,"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11(6), 1996, pp.619-632.

五、结论与启示

补贴收入对企业的出口动态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一影响依赖于企业所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水平。具体地,在政府对经济干预水平较低的地区,补贴收入不仅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还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存活能力;而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补贴收入对企业出口活动的作用则将由正转负。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揭示了政府补贴和企业出口动态之间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在政府干预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手中握有更多的分配补贴资金的自由裁量权,官员更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主动设租以谋取个人私利,企业为获取补贴资源需要主动向政府官员支付一定的“补贴成本”。同时,在政府干预程度更高的地区,寻租空间更大,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激励大于研发创新激励,获得补贴资金的企业更不倾向于把补贴收入投入研发创新,进一步地影响了补贴收入对企业维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的作用。

行政干预下的寻租空间容易扭曲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的作用,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绩效的正向作用依赖于更完善的营商环境。在营商制度和经营背景更健全的市场环境中,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提高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利于企业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持续竞争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上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维持其出口地位。因此,推动市场化进程、提供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不仅能够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更是中国出口企业实现竞争方式转型升级、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s' Export Trends: The Importance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Ye Ninghua, Zhang Bowe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xport trends of enterprises depends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enterprises are located. In regions where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s are low, subsidies can not onl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exporting, but also help enterprises maintain exporting status. On the other hand, in regions where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s are high, the impacts of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export are reversed to be negative. Further empirical tes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the more important role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f enterprises play in getting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less effective in terms of promoting the R&D activities in enterprises. Therefore, lower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ill be helpful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patterns.

Key Words: Business Environment; Government Subsidies; Export Trends

【责任编辑:陈瑞香】